

EC39/2009

资中县志

编者的话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从此，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四川的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它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其中，资州罗泉会议，是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发展为全民武装起义的转折点；捕杀端方给予了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四川各地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运动的发展；刺袁三杰之一的杨禹昌烈士为保卫辛亥革命果实，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是为了讴歌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先烈的英雄业绩，我们辑选了在资中发生的、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几件大事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编印了这辑资中文史资料，以后还将陆续编辑各方面的史料。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掌握的资料不多，文章中漏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热情希望广大干部、群众给我们投寄资料或撰文写稿，积极将1911年至1981年我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商业、财政、金融以及风土人情、山川变迁等重要情况反映出来，努力协助我们编好《资中文史资料》和《资中县志》。

来稿请交：资中县编史修志委员会办公室。

——编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四川保路运动

蔡雪舟

1911年（辛亥年）四川人民筹资兴建川汉铁路，当时称为“商办”。而满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在“铁路国有”的幌子下，以借款方式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引入川、鄂，遭到两省人民的反对，特别引起川民的反抗。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还要迟一年半载。”

辛亥秋，四川人民展开罢市、罢课、抗粮和抗捐运动，在同盟会和保路会领导下，斗争达到高潮。当时四川总督赵尔丰（因残杀革命党人，早有“赵屠夫”之称），在总督衙门前，把成都人民反对“铁路国有”而组织请愿团的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楷和邓孝可等领导人逮捕，并下令军警开枪射击群众，当场打死四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在赵尔丰的疯狂镇压下，四川人民没有被吓倒，反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同志军大起义。

早在1905年，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人民为了争取民族自立，决定自筹资金，民办铁路。

1911年，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将川汉、粤汉铁路夺过去，并以借款为名，将路权出卖给英、美、法、德四个帝国主义，这就激起了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发展。

罗泉会议

资州罗泉井会议是辛亥革命在四川由保路同志会开展为同志军武装斗争的转折点，是中国同盟会把保路运动转变为反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后，四川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清王朝的斗争形势迅猛发展。同盟会党人认识到必须深入群众，组成群众武装力量，才能战胜清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四川的哥老会是一种群众性很广泛的组织，其潜在力量遍及全川各县各阶层。其中的进步力量并曾发动和参加过以往的反帝、反清王朝的斗争。中山先生有见于此，在1906年曾召川南哥老会首领余竞成到日本东京面授机宜，命他组织群众，开展武装起义。余回川后，先后在泸州、江安、叙府、隆昌、广安、嘉定起义，虽屡告失败，但已证明哥老会这一力量，就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来说，是不可轻视的。同盟会党人决定联络哥老会，开展群众革命斗争。

同盟会党人龙鸣剑等回川后，在成都创办四圣祠法政专科学校，作为进行革命的掩护，并在其他偏僻之处，设立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他们曾经联络川西南哥老领袖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人参加同盟会，积极准备进行革命。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各县纷纷成立分会；各地的哥老会也公开活动起来。成都同盟会党人认为立宪派要的是两面手法：一面紧抓保路同志会，作为向清廷要挟的资本；一面又惟恐清王朝的统治受到动摇，因而极力限制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实质上是反动的。同盟会党人认为必须利用时机，对立宪派采取“明同暗斗”的策略，即“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不另树立旗帜，即以保路同志会作为活动和斗争的工具。因此，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的主张时，同盟会党人就大力予以驳斥，并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铁路国有”的弊害，政府的恶劣，使人人明了清廷的不可信赖，非进行革命不可。

同盟会党人感到没有可依靠的武装力量，不能在省城发难，只有进一步把哥老组织起来，从中取得领导权，在各道同时并举，成都乘机起义响应，才可能取得成功。于是龙鸣剑与秦载赓等商议，以秦的名义，用鸡毛文书传达各地，号召哥老首领于1911年8月4日（闰6月10日）在资州罗泉井开“撺堂大会”。因为这天是四川铁路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开会日期，清清官吏无暇注意及此。同盟会党人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都亲往赴会。各路哥老首领参加者计有秦载赓、罗子舟、胡重义、胡朗和、孙泽沛、张达三、侯国治等人；有的首领则派来“管事”代表出席。会议是深夜在罗泉井福音堂举行的。团总钟岳灵派出“看哨”到一、二十里以外，防备清兵袭击。会议名为“撺堂”，实则商讨起义方略。当夜决议5项：（1）探查敌情：先行探查清廷在四川的新旧军队及全省警察有多少人，驻在哪些地方；（2）交换情报：各地要随时互相交换消息，向华阳和新津总部汇报，以便明了军情；（3）枪弹来源：起义的枪支子弹，向各该地团练局及富绅借用，将来归还；（4）粮饷问题：向各该县借用积谷、社谷及其它公共财物，作临时开支，不向民间摊派；（5）严肃军纪：各路发动的同志会一律改称同志军，推举人员统率，必须严肃军风纪。会上并推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的起义工作；川西北则由张达三、侯国治等号召进行。

会议刚结束，就得知成都清兵集中，不易得手。于是决议在旧历七月间各地同时或前后相距几天起义，以分散清军力量。

罗泉会议后，龙鸣剑回成都，在四圣祠召开秘密会议，亲自作报告。龙鸣剑仆仆奔走于成都与各地之间，有时又分派同志到各地联络并督促起义。唐宗尧曾被派到荣县、仁寿、威远、井研等地联络。9月7日（旧历7月15日）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罗纶等9人，大肆屠杀和平请愿的人民。同盟会党人曹笃、龙鸣剑、朱国琛等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将惨案消息大书于木牌上，乘夜分投江中。时值秋水上涨，木牌顺流急下，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秦载赓、侯宝斋速即围攻成都。龙鸣剑星夜赶回荣县，率领起义军会攻成都。同时吴庆熙、向迪璋、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重义、胡朗和等纷纷起义于仁寿、温江、双流、新津、崇宁、灌县、雅州、屏山等地，全川的革命斗争，迅即开展起来。

（根据四川文史资料选辑整理）

杀端方

周叔平 周嗣荣

端方字午桥，姓托克武氏，满洲正白旗人，是一个善于钻营官场，残酷统治、屠杀人民的官僚、刽子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逃到陕西，适为陕西布政使的端方，便乘机谄媚太后，旋擢升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江西总督。

宣统元年（1909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慈禧死去安葬时，端方又借此机会派人照象，在同僚中炫耀他曾是出洋考查大臣，懂得使用洋货，是主子的亲近；也向主子表示，是其忠实奴才，很会效劳。那知出乎意外，竟遭到隆裕太后喝斥，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但他并未由此匿迹，而是到处钻营，冀图再起。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的诏令后，他便设法巴结摄政王载洋，不到10天，即出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上台后，他坚决地执行清廷“铁路国有”的旨意，大借外债，抢夺四川各阶层人士辛苦凑集的修筑铁路资金，顽固地坚持卖国卖路的反动立场，于是激起群众性的保路风潮。

为镇压四川人民的反抗，清廷命端方“入川查办”。端为安全计，指调旧部协统邓承拔、标统曾广大率湖北新军31标及32标一部分共2000余人西上，并加以严密控制。其实，湖北革命党人早就以军队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用当兵作掩护，在军队里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鄂军出发前夕，留鄂新军与入川新军的革命党同志约定互通情报。其电报暗号是：“母病故”为起义成功；“母病危”为起义有成功希望；“母病愈”为起义失败。

端方初入川，各县代表沿途向他请愿，均不理睬，10月5日抵万县后，回答重庆代表请罢入川军队等要求时，也公然谓“川人称乱，率兵乃朝廷命令，不能中止。”傲慢强横，不可一世。鄂军中革命党人李绍白、田智亮等则与各营代表王志强、赵振民、孙斌、陈道行和31标1营督队官陈镇藩等进行秘密会议。这时，由四川同盟会负责人杨庶勣、张培爵派来接头的张颐正好到来，与田智亮联系上，共同议定待机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形势急转。端方知归路已断，便一反常态，把借债、收路事归罪于赵尔丰。又上奏清廷，把赵所逮捕的蒲殿俊、罗纶等保路运动9人“恳天恩即予释放”，妄图逃避罪责，摆脱自身危机。赵尔丰怀恨端方逼己落职，便电告端方说：“如来省，定以督练公所招待之。”11月14日，端方到达资中（原资州）后，不敢再向西进，暂驻节资中，以观变化。尽管如此，他贼心不死，仍力图反扑，派人援助各地反动力量，威远奸绅郭藩派人刺杀了民军首领胡取垓，将两耳函送端方；井研杀死了东路民军首领秦载赓，自流井烧死了东路总参谋陈孔白。旧债新仇，使鄂军中革命党人决心诛杀端方，以打击地方反动势力。

11月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拨士兵300与田智亮，嘱其兼程赶到资中。智亮行至离资60里处，便与鄂军同志接上，通夜商谈，一致赞成立时起义，捕杀端方。

与此同时，端方也知形势发展对他越来越不利，现已是进不能到成都，退不能回武汉，再住资中，实属坐以待毙。有人劝他微服出走，但他不甘心，却决定带兵逃出四川，作最后挣扎。25日晚，端方在东门湘园召开鄂军军官会议，提出所谓北上勤王（即复辟）的主张，率鄂军取道广元、汉中到河南去与袁世凯会合。26日上午他又向各标、营遍发印有陶方字午桥的名片，并在鄂军中散布他端方本汉人，姓陶，入旗还不满四世，想以此减少鄂军对他的仇恨，骗取鄂军对他的信任。又下发路站旅程表，通知各标营筹集粮秣，准备出发。并叫心腹进行游说活动。鄂军识破他的鬼计，抢先动手。

26日晚，鄂军党人召开紧急会议，公举31标1营督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并约法三章：一、驱除鞑虏，建立共和；二、誓杀端方；三、回电武昌响应。当晚城门大开，鄂军来去匆忙，驻禹王宫的朝万寿宫走，驻东岳庙的朝天上宫走。行台（端方住处，今公安局所在地）内外，更是灯火通明，到处布满岗哨，如临大敌。标统曾广大、协统邓成拔知有异动，劝端逃匿，端意犹不决，曾、邓见状，遂出而缙城逃走。于是端方亲信军官十余人，也改装跑了。

27日（旧历10月初7日）凌晨，一队起义士兵拥入端方卧室。端始知不妙，忙从床下拉出一口扁箱，妄图以金银收买大家。起义士兵鄙视而愤怒地骂道：瞎了你的狗眼。伸手把他揪出房门，同时把端锦从另一房间揪出，一并向街西头押去。这时，端方吓得软成一团，不能行走，由士兵拖到协本部——天上宫（现城区粮站仓库处）。大殿前坐着起义统领陈镇藩，标统陶某出来发表演说。宣布清王朝出卖民族利益和端方来四川镇压人民的罪恶事实，语甚激昂。演说完毕，便大声询问谁出来执刑。平时的骄横残暴，不可一世的端方，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向起义士兵磕头如捣蒜似地哀求免死。革命的意志，民族的大义，使大家认清了端方的丑恶面目，起义军中的卢保卿出来挥刀杀了端方，任永森杀了端锦。把两颗头颅装进匣内。鄂军及资中都宣布反正。全城居民，毫无惊扰。革命军叫街上住户和铺店各赶制一面三角形白布旗，用朱红写上“大汉民国”四字。四大城门和十字街口都贴了告示：“满人酷待汉族，业已二百余龄。今日人心思汉，全国革命成功。满贼端方兄弟，俱予明正典刑。我军长驱回鄂，勿得骚扰人民！”

11月28日，全部鄂军，整队出大东门，向内江进发，返回湖北。资中人民，结队相送。

端方被杀，大长了民军的士气，大灭了反动势力的威风。消息传出，内江知县闻风逃窜。吴玉章同志率众接收了团练局的枪枝，宣布内江独立。进攻自流井的民军也取得胜利，成都四周民军声势大振，清王朝的统治迅速地在四川土崩瓦解了。

鄂军在资中起义，捕杀端方，受到四川各界的欢迎。重庆军政府特专门发布告示，晓谕全川。告示说：“鄂军之明于大义，造福吾川，不特本都督苦志光复之心，当所钦佩，亦吾蜀同胞父老子弟所共当欢迎者也。……今者，鄂军东归，本军政府极表欢忱！”

鄂军胜利返回武汉时，也受到湖北军政府的热烈欢迎。

端方来资州前后杂记

张善良 王志康

端方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带兵入川，由东大路经唐明渡来到资州。当时他坐的是八人大轿，后面跟着200多条龙杠，不消说这里面放的是沿途搜刮的金银珠宝和古董玩器，由此就可见端方的为人。

当年曾在唐明渡撑端方过河的老船工周大鹏现尚健在。当时端方曾命跟班赏给船工们20两银子。可是跟班从中扣了8两，只给了船工们12两。

有一天晚上，端方在寝室内越想越怕，总是睡不着。他喊醒了小跟班福安，两人换了便衣，揣了些银元，以出外散步为名，悄悄地溜出行台，走进一条小巷，意图逃匿。殊不知转了转，还是大东街，马上被民军找到，把他送回行台，加强岗哨戒备。

端方在资州时，每日设燕窝烧烤席一桌，鱼翅席四桌，海参席二十余桌，与军官们吃喝，采取笼络的办法。又常在宴饮中说：“我本汉人，投入旗籍还不满四世。我本姓陶，浙江人。我还是赞成革命，不象别的满洲人那样顽固……”企图借以欺骗活命。

杀了端方，鄂军离开资州抵达内江时，吴玉章同志已率众接收了团练局的枪支，宣布内江独立，并举行了欢送鄂军在资州捕杀了端方、东下援助武汉起义的大会。内江人民看见鄂军雄赳赳、气昂昂的英姿和严整的行列，表示热烈的欢迎。

杀端方故事五则

罗荣波 卢荣安

(一)

端方抵重庆时贴出告示。夜间有人在告示下每句加注两字：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不等迫切请求，（何曾）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二)

端方在重庆时，有人在临街墙上写出一副对联：

端要死在江南馆，
方好抬出水东门。

(三)

端贼在天上宫被杀后，有人在街上捡到他吓掉的瓜皮帽。据说顶子是东珠做的，相因卖都卖了一百元大洋。

(四)

端方另一个兄弟端老七，趁拖端方出行台衙门时，跳下城墙，找到廖承祥，要求设法带他逃走。到了重庆，他送廖黄金二十两和其他一些值钱的东西。廖本来是个没有什么钱的干人，得到端老七这些货财，回到资中，在东门外买田置宅，居然富翁了。

(五)

杀端方时，资州州官姓朱，总爷姓杨，都吓得弃官而逃。当时群众流行着一句谚语：“杀朱宰杨打端娃。”（那时称庆坛神为打端娃）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资中人民对满清腐败政府官僚可耻下场的喜悦情绪。

杨烈士节略

骆成驥 遗作

君禹昌，字敏言，资州人也。年二十七岁。生而颖悟。既长，游学富顺。师见其胆气过人，知为大器。后旋里，有势豪凌人，君不平，抗辱之。势豪百计逼君。君因去北京，留学蜀校，时丁未春也。平时循循若处女，及谈天下事，意豪迈，大有冲天惊人之概。惟性与算数、体操不宜，醉心历史、地理，而于国文、辩学尤三致意焉。次年冬，清陆军部招考师范。君曰：“当今为武装之师范，为造成武装之母。吾苟能入毅，则满清之亡，其在是乎！”后果如愿，以国文专科毕业，派教清河陆军第一中学，就定本中翻陈出新，灌输革命宗旨，以故与生徒甚契。执事者觉而去之。君泰然自得，去蒙古、张家口。闻感激时势，多寄情诗文，以自壮其志。辛亥暑期，执事去，复归。逢秋八月，武昌事起。君罄所得薪金，分给学生，联袂南下，经某君介绍入同盟会。时南北激战甚剧。君曰：“京师乃南北根本地，若不先事解决，则各省虽哗，亦枝节耳。”乃与友携炸弹、手枪，复归北京。又以会中各部均处满清势力范围下，其效微，入胆大心细之暗杀部。时袁世凯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与民军构和。殊袁氏佯假和议，实欲帝制自为，故表现于外者，捕拿党人，进窥山陕，灰烬汉沔，离间山东独立，致民军有不可终日之势。君曰：“袁氏袭满清全权和议……。今议和期限业延三次，和平之望仍属子虚。事急矣，请先杀袁氏。”继思曰：袁氏若杀，恐其党羽众多，四出蹂躏，必非民国幸福，是杀不杀均甚困难。吾欲杀之而不致之死，使彼能专意共和，吾愿已遂，否则致之死，计必不难。吾请先，诸君可随后。议遂决。适和议期满。后三日，与黔

省张君先培、黄君继明同遇害于北京丁字街，时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时也。袁氏经此刺激后，果绝对赞成共和，民国统一。杨君籍隶我资，于民国建立功颇伟，中央及本省俱有抚血追悼，州人士若弗闻问，在烈士为民国死，固无半点希望名誉权利之心，而我辈获享共和幸福，又何以慰志士英灵？兹特发起将前清官亭改为烈士专祠，并于旧历六月二十七日午前开追悼会。君子若肯以诗文楹联见赐，或为征聘佳文，则不仅表彰烈士，资中人士亦有荣焉。

刺袁三杰之一——杨禹昌烈士

刘介眉

杨禹昌烈士，字敏言，1885年（清光绪十年）出生于资州南乡马道子庙二山附近（今资中公民区马道子公社）一个农民家里。祖辈世代农耕，家道贫寒。

少年时代的杨禹昌生活穷困。但他生性敏慧，读书过目成记，因此得到同村一个姓丁的塾师的赏识，劝他父亲送他读书。杨禹昌白天割草种地，晚上挑灯夜读，十分勤奋。

杨禹昌十七岁时，去富顺求学两年，学问迅速长进，胆识过人。他回到家里，看见本乡恶霸团总黄光明武断乡曲，欺压百姓，因此愤愤不平，奔上前去狠揍黄光明两记耳光。黄光明被打，怀恨在心，命令爪牙四处捉拿杨禹昌，声言“要死的，不要活的”。杨禹昌被逼，只得离乡背井，去到北京，考入陆军师范学校。

杨禹昌在陆军师范学校毕业后，被派到保定陆军学校担任教官。在这期间，他目睹清王朝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对中国蚕食鲸吞，加上官贪吏虐，民不聊生，中国危棋四伏，决心起来革命，参加了京津同盟会。自此之后，他利用一切机会，经常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并且以度假为名，北上内蒙古、张家口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成功，袁世凯以清朝总理大臣的名义玩弄阴谋，操纵南北和议，阻挠清帝退位。京津同盟会为保卫革命果实，决定先杀袁贼。杨禹昌和黄芝荫、张先培三人慷慨请行，以身许国。

民国元年（1912）元年六月，杨禹昌等三人潜伏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待袁世凯退朝回家，掷弹炸袁不中（当时仅炸死了袁的侍卫长袁金彪，炸伤护卫兵数人），三人被捕，壮烈牺牲。

杨禹昌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革命党人把他们的遗体埋在高碑岗。清帝退位，孙中山先生到北京后，又把他们和因炸良粥而死的彭家珍烈士合葬在三贝子花园（今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内，称“四烈士”。

杨禹昌牺牲的消息传到资中（当时称资州），资中各界人民为纪念杨禹昌烈士以身许国的壮烈行为，举行了追悼大会。由当时资中著名人士骆成襄（清末壮元）为他撰写了事略，以资纪念。资中人民还在北门外场口上修建了杨烈士祠。

1954年5月5日，为了表彰杨禹昌烈士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毛泽东主席发给了杨烈士家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碧血映丹心 浩气贯长虹

杨邵青

去年，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庄严决定：本年十月十日隆重地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这项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的祖父七十年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壮烈牺牲了，英风不泯，浩气长存。有功于人民的人，人民也永远纪念他。

先祖父杨禹昌，字敏言，籍隶四川资中，出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年），世代农耕，家道寒微。我的祖父半饥半饱地度过了他的童年。但他生性颖悟，为同村一个姓丁的塾师所赏识，力劝先曾祖锡佐公令其就读。授之书，辄能过目成记，因此受到乡里夸许，目为大器。但因家庭贫困，每际农事繁忙，不得不辍学从耕。故常挑灯夜读，每至鸡鸣不已。

先祖父十七岁时，在一个家道殷实的富顺宗族的支助下，得以游学富顺。经过两年潜心攻读，文思大进。1894年先祖父十九岁时，自富顺回家，仍从事于农作。但对清室的腐朽，国家的危殆，人民的疾苦，早已洞悉胸中，种下革命种子。同年，一个流寓自流井的同宗因在外发迹，回乡购置田产，先出招字，通告卖方债权人于限期内与买方清理债务。及限期已过，本乡恶霸团总黄光明，平素一贯作威作福，鱼肉乡里，今忽横生枝节，说他是卖方债权人，当即与买方发生口角。他态度狂傲，语言污秽，甚至动手打人。那日正逢场期。先祖父看在眼里，愤集心头，便直前评论曲直。黄光明一贯唯我独尊，哪里把他认为是“乳臭小儿”的人放在眼里，便挥拳打我先祖父。先祖父疾恶如仇，正思予此恶霸以惩戒，便奋勇批其颊，狠狠地给这恶霸两记耳光。黄光明素为群众所痛恨，他被打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并盛赞先祖父的侠义行为（现在我乡父老每谈及此事，犹津津乐道，咸谓我先祖父：袁世凯这个老虎的屁股都敢摸，你黄光明自然不在他意下了）。黄光明在大庭广众之中，以团总之尊严，受孺子之喝击，气得吼叫如雷，立即下令追捕，务必致之死地。幸赖群众极力掩护，先祖父始得只身逃脱。黄光明侦骑四出，并囑爪牙：“要死的，不要活的。人命案，老子豁出两块萝卜土打点就是。”先祖父有家难归，藏匿无地，赖同学刘铁樵在资中城内的亲戚李文兰的资助和先曾祖辗转托人以高利求贷，才高飞远走，到了北京。先祖父在北京考入清廷所办的陆军师范学校。尝语人曰：“方今列强虎视，国事螭螭，大丈夫当以效死疆场，马革裹尸为幸。”在陆军师范毕业后被分派到保定陆军第一中学校任教官。在此期间，先祖父目击时艰，认为中国社会之现状，非改弦更张不可，便毅然参加京津同盟会，并在学生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推进革命运动。除此之外，还利用暑假到内蒙古、张家口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写诗文以寄情见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据清室内阁总理大臣，挟权自重，一方面胁迫清帝溥仪退位，一方面蓄意延宕南北和议，其目的

实欲帝制自为。革命党人鉴于功在垂成，而袁贼从中梗阻，居心叵测，无不义愤填膺，亟欲灭此朝食。因此，京津同盟会决议首先扑杀此獠，扫清革命障碍。先祖父慷慨许身，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1月16日，先祖父偕同党人张先培、黄芝萌携带炸弹，潜伏于丁字街茶楼（据溥仪回忆，在东华门便宜坊酒楼），俟袁退朝路经丁字街时，以居高临下之势，将炸弹掷向袁贼。结果只炸死炸伤了袁贼的侍卫长袁金标及侍卫多人。袁贼立即下令搜捕。先祖父及张先培、黄芝萌同时被逮。

先祖父等被捕后，袁贼先行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先祖父等不为所动；继则非刑榜掠，亦不为所屈。刑讯时袁贼问及主谋，先祖父等三人以当时南北和议正开，俱坚不吐实，只以国人皆欲杀汝相置。复问父母妻孥，先祖曾以“天是父，地是母，中华民族便是大家庭”相抵制。各受毒刑后先祖父等三人壮烈殉国。先祖父死时年仅二十七岁，尸体为革命党人潜埋于高碑岗。身后所遗袂被、衣物、书籍由资中状元骆成骧带回。据祖母说，尚有祖父受刑时的血衣等件。

清帝逊位，民国底成。孙中山先生亲到北京，把先祖父及张先培、黄芝萌的遗骸由高碑岗掘出，与因炸良弼成功而死的彭家珍一起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即今西直门外的动物园），谥称彭、杨、张、黄为“四烈士”，号其墓为“四烈士冢”，并赞先祖父与张、黄二君为刺袁三杰。孙先生亲临葬礼。其后，除每年发给抚恤金外，并饬在原籍建立专祠，表彰功绩，永垂不朽。

附录胡适所作《四烈士歌》（并序）。

辛亥革命时，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用炸弹炸袁世凯，不成而死；彭家珍炸良弼，成功而死。后来中华民国成立了，民国政府把他们合葬在三贝子花园，名为四烈士冢。冢旁有一座四面的碑台，预备给四烈士每人刻碑的，但只有杨烈士的碑，其余三面都无一个字。（民国）十年五月一日，我在天津住在青年会里，梦中游四烈士冢，醒时作此歌。

他们是谁？三个失败的英雄；一个成功的好汉。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他们干了些什么？一弹使奸雄丧胆；一弹把帝制推翻。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他们不能咬文嚼字；他们不肯痛哭流涕；他们更不屑长吁短叹。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他们用不着纪功碑，他们用不着墓志铭，——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他们的纪功碑，炸弹、炸弹；他们的墓志铭，干、干、干！

杨邵青于资中公民中学

1981年3月28日

（注）本文根据杨邵青同志的原作，有删节。

辛亥革命三章

周叔平

一

伟大辛亥革命年，
驱除鞑虏兴中华，
黄花岗上血方碧，
捕杀端贼龙山下，

缅怀孙公创业难。
建立共和均地权。
武昌城外战正酣。
义军烽火遍全川。

二

满清政府骗川民，
罪魁总督赵屠户，
保路同志雄心树，
同盟哥老罗泉会，

铁路国有媚洋人。
祸首钦差端大臣。
请愿民众义尸横。
反清旗帜最鲜明。

三

窃国袁盗抱野心，
祸川甘与赵端合，
逼迫南方革命党，
燕市悲歌杨烈士，

共和果实肆鲸吞。
得利乐于鹬蚌争。
掌握北洋反动军。
一弹奸雄破胆惊。

郑先贞同志在县级机关

编修专志会上的讲话（摘要）

今天我就编史修志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为什么要编史修志？

编史，主要是广泛征集编写党史、现代史、近代史；修志，就是编写地方志，即省志、州志、县志、乡志、机关志。今天着重讲修县志、机关专志的意义和任务要求。

一、编史修志的重大意义

地方志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地方志的起源，早在周朝就有“四方之志”，即诸侯各国的历史书，东汉以来，各种区域性专著，如山水志、人物志、风俗志、图志、物产志，全国普遍出现。光武帝诏选的《南阳风物传》，袁康、吴平的《越绝书》、酈道元的《水经注》，裴秀的《禹贡地域图》等等，为写地方志以极大的影响。随代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这是我国中央政权通令全国修方志的开端。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盛世修志”已成为历史前进的重要标志。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史官，重视史志的编修工作，他指定左丞相房玄龄专门监修史志，并规定各州郡三年编造一次以舆图为主的地方志。到了唐宋，地方志体例开始形成，元明就更加完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朝廷曾多次下令修辑志书，规定省、府、州、县志书60年一修，使地方志达到极盛时期。我国现存地方志8,500多种，109,143卷。

为了继承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就规定，要“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要“收集县志、省、地、府志，家谱，加以研究”，还要“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道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建国后，党和国家很重视地方志的编纂。1956年，科学院提出编写地方志的任务，1958年10月起草了重修地方志的体例草案。毛主席也曾倡议编修地方志。周总理也指示要系统整理地方志中的经济、科学资料，做到古为今用。1959年，国家档案局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周总理接见代表时也问及地方志的编写情况。董老、谢老也曾多次督促这项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6月止，全国有20多个省、530多个县进行了修志工作，有250多个县编出了初稿，其中山西1958年有20个县完成了编志工作，油印了初稿。十年动乱，停止了这项工作。陈云同志1977年说，最重要的第一步要化二、三年的时间，立党史资料，要立得准确，这是个基本工作。历来（包括封建社会）写历史的人都要不怕杀头，是就是，非就是非，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的就是错的，都要把它记载下来，不能歪曲历史。只要我们把党史资料真正实事求是地、准确地留下来，一旦有坏人要想篡党夺权就不怕，他要想篡改历史也不行，我们的子孙可以据史实翻过来。

耀邦同志1980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关于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斗争史，写成不事夸张的回忆录发表和保存是必要的。

乔木同志说：“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史学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资中有州志，有县志，县志写到1929年就断限了，解放前缺整整20年，解放后又30多年了。现在知道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历史的人不多了，如果再不动手，这些知情干部、群众还将会逐步减少，那时再来着手办这件事，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我们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代，封建社会能够办到，就连腐败的国民党也非常重视地方志工作，我们共产党应当比封建王朝高明多少倍，这

件事能够办到，而且应当比过去办得好若干倍。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学术工作的一个好传统，是一项很重要的历史研究工作，是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份。编修新地方志，不仅可以为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积累提供资料，而且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都有一定的帮助，为我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依据和借鉴，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建设。

方志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物、矿产资源、天文气象等各方面的资料，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有很大的作用。中央地质部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查阅大量方志，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锻冶》、《中国古今铜矿录》，遵照地方志提供的线索进行勘探。中央气象局汇编了《五百年以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编辑出版《中国天文气象总表》，这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来说，无疑都是非常宝贵的。

从方志中，可以了解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起义连续发生的情况和规律；可以了解自然地理、自然灾害、气候、水文不断变化的情况和规律；可以了解各地人口增减、物产的丰欠、动植物和水族生长、迁移、灭绝的情况和规律；可以了解各地经济、文化逐渐演变的情况和规律，对这些加以马列主义的分析研究，就能利用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地方志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的特点。研究有关自然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的资料，是进行基本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研究方志中有关农业的资料，总结我国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为培养优良品种，提高操作技术，增加产量，为社会主义农业提供科学依据。日本渔业发达，早在40年代，就根据《八闽通志》、《露浦县志》编写论文，使渔业生产取得巨大成绩。研究方志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有选择地继承一部分遗产，将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力量。天文学、机械学、地理学都有室贵的价值。如关于极光的记载，湖北《竹溪县志》有“同治3年8月19日（公元1862年）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初出声凄凄然，光芒闪烁，人不能仰视。倾之，向北一泻数千丈，欲堕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及后犹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10年后在1872年2月4日，太阳大暴发，在印度7个地方都观察到极光。我国很多方志都有记载，极光的研究，涉及通讯、广播、空间探测和宇宙航行的空间科学，意义十分重要。

中国地方志非常宝贵，国外收藏很多。日本来我国采购方志，有150年的历史。40年前听说地方志不值钱，他们采购时，不是论卷，也不是论斤，而是用一根拐杖的长度来定方志的价格。因此，日本所藏我国稀有方志数量很多。我国所藏残缺不全，而日本则有足本。1956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向日本摄制胶卷。最近北京图书馆国际交接组从日本搞到稀见的中国方志胶卷43种。

美国国会图书馆，1939年至1942年藏有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地方志2,000多部。哈佛大学30年代已购中国地方志1,600部。哥伦比亚大学也有1,000多部。芝加哥大学1,500部。一位美国农业专家利用中国地方志中关于广东柑桔和福建福橘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已有多多年，有一种猕猴桃是河南品种，极为稀有。

法国汉字专家伯希1,200年前从敦煌盗走《西山图经》和《沙州图经》，价值极高。

地方志记载大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资料，是进行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的乡土教材。如浙江《双林镇志》记载太平天国革命事迹。光绪《宁波厅志》记载少数民族起义的事迹。《感恩县志》记载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偷偷测绘我国地图的情况：“日本志贺氏于清季光绪年间，带其徒弟数人游历我琼州之黎阴，而绘其山川形势以归”。《齐齐哈尔志

稿》上还有沙俄武装镇压我国黑龙江义和团的罪证——修筑东清铁路图片册。资中的杀端方、刺袁烈士杨禹昌等，应当把这类材料写成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史，总结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正反经验，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提高政治觉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编修地方志，可以锻炼和造就一批懂行的干部队伍，也是对职工进行职业教育，提高业务水平的好教材，可以激发职工群众的乡土情，民族感，使他们更加爱乡爱村，爱国爱家，努力建设家乡，为振兴中华奋发努力。

编修地方志，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上对祖宗负责，下为子孙造福，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千秋大业，是团结广大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总起来说，编史修志，是服务现代、遗墨子孙、造福后代的大好事。关键是各级领导的重视，要把编修地方志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抓起来，发动群众，调动有关方面的力量，做好组织落实工作。

二、明确编委会的任务和编修机关志的要求

县编史修志委员会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统一组织领导县志和机关各单位专志的编纂工作，其具体任务是：讨论决定县志编纂方案，规划审定县志和机关专志的体例或工作计划，审查县志并最后定稿，以及其他需要编委会确定的重大事项。编委会下设办公室，请有关单位继续充实力量，落实经费开支。编委会办公室的任务是：参加编写县志，进行日常行政事务，制定工作计划，联系和督促检查各专志的编辑工作，组织和参加初审各专志的稿件，收集和管理有关地方志的各种资料等。

县级机关各单位要在对县志纲目提出修改意见的同时，联系本单位在县志中所占的篇目，考虑和安排自己专志的编写纲目。初步计划，以下单位要写专志：农业局、水电局、林业局、畜牧局、气象站、工业局、交通局、二轻局、社队企业局、物资局、劳动局、邮电局、农机局、商业局、供销社、外贸站、粮食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管局、良行、卫生局、文教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广播局、体委、工会、物委、科委、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民政局、建设局。分期分批的要求是，在今年底完成初稿的有农业局、水电局、林业局、畜牧局、气象站、工业局、商业局、卫生局、文教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广播局、财政局、良行、二轻局、交通局、供销社、粮食局、税务局、工商行管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民政局、劳动局等24个单位；在明年上年完成初稿的有社队局、农机局、邮电局、外贸站、体委、工会、物委、科委、物资局、建设局等10个单位。有条件的乡社，也可以写乡志。其余没规定写专志的各局和厂矿企业单位，要根据县编委会的统一安排，积极配合，收集资料，为《县志》提供资料，并写出企业、事业史。

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编写人员。各局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设立专志编纂领导小组，分工一位局领导同志主管这项工作。其他写作人员应由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历史和专业知识、写作能力，并对修志有热情的同志参加。

三、编修县志、机关专志的方针与方法

新志的编纂，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整个编纂工作，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这是我们编纂新志的基本方针。

新志要具有科学性，要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从事编纂，本着“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编写原则编好县志和机关专志。

编纂工作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扫除思想障碍，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秉笔直书。

关于工作步骤和方法问题，首先，应在提高修志认识、掌握基本要领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草拟新志纲目。应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内容和重点，专志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概况；2、体制和机构；3、人事组织活动；4、业务及其职能（这是机关志重要内容）；5、政治（历次党代会、职代会、团代会及党政工团的活动）；6、名人、名物、名产品；7、正反大事。

其次，要大力抓好资料工作。资料是修志的基础，要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考核、整理工作。要根据县志和各专志辑录范围，拟定资料收集、整理、保管、使用等规定。原则是：立足于“抢”，收集宜广，发掘宜深，真伪宜辨，精粗宜分，采用宜慎。可用调查访问，行文征集，查阅档案、报刊、图书、文献、谱牒、金石等方法，广征博采，尤其要注意活资料的收集，或作采访笔录，或约写回忆资料，或一事一卡摘抄，或择要复印。积以时日，分类归并，严加考订，编写专题或综合性资料，构成资料汇编。时间从辛亥革命即1911年开始为上限，到1981年止为下限。有的也可以突破断限。

第三，认真编、审稿件。在掌握充分资料、制定编写提纲细目、明确体例要求的基础上，开展编写工作。先式写个别章节或项目，共同研究修改，求得在体例、写法上合乎规范，然后定人定题，分头编写；各部写完后，集中编纂，删繁补要，连贯全篇，并求得体例、文风的统一。经过局编纂小组和局党组织审查后，再交县编委会审批，并分别出版各局专志。

县编委会召开编修县机关专志会议

资中县编史修志委员会于7月12日召开了编修县机关专志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各部委，县级各局行的负责同志及秘书或工作人员共140多人。县委副书记、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长张志诚到会并讲了话，县编史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郑先贞就编修县志、机关专志的问题讲了具体意见。会议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落实了34个局级以上单位编修专志的任务。这次会议，对于加速机关志和《资中县志》编修将发挥积极作用。

县财政局抓紧落实编修《财政志》任务

继县编委会召开编修县机关志会议后，资中县财政局于7月20日召开局务会，决定成立编修《财政志》领导小组，设立编志办公室，组织三名干部编写财政专志。目前，财政局编志办公室拟订的《财政志》纲目（草稿）已送县编委会办公室审查，该局编修专志已有良好开端。

《资中县洪灾志》即将出版

为了继承先辈的抗洪业绩，总结防洪抗洪的经验教训，让当代和后人不断探索自然规律，使沱江更好地造福于人类，资中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组织编写了第一部地方性专志——《资中县洪灾志》。该志介绍了沱江流域资中段的自然地理概况，再现了史料中关于1949年前的洪灾景况，搜集整理了解放五十年来的洪灾资料，突出地记述了1981年我县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全书共4章16节，内容翔实。目前县领导正在审稿，预计不久即可出版问世。